

一本书读懂中国的“金名片”

——评《国家名片：中国的世界遗产》

□王 崇



鼓浪屿全景

2026年7月,中国的世界遗产再添新成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作为一个旅游爱好者,我在选择目的地时一般首选世界遗产地、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可是经过“官方认证”的。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那就是“国际认证”了。目前,全世界得到这一认证的仅有1273项。奔赴打卡地之前,认真做好功课是必不可少的。做攻略、查资料,一是为了让行程更加从容,二是为了让这场奔赴更有目的性、更有获得感。为此,我入手了不少文博类图书,而最近翻得最多的,是《国家名片：中国的世界遗产》(以下简称《国家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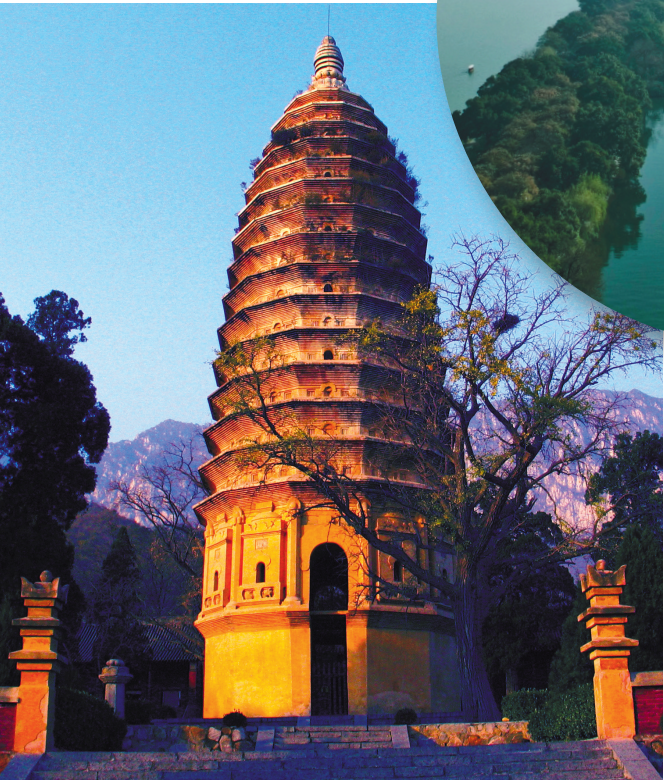
每一项世界遗产的入选,背后都有漫长的过程和曲折的故事。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大运河”。因组织编写《中国运河志》,我得以对其申遗历程有所了解。从“运河三老”发出公开信到申遗成功,8年的申遗之路,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当年负责编撰《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的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该院拥有专业的团队,深耕遗产保护研究多年。《国家名片》正是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

将中国的世界遗产称为“国家名片”,这个说法深得我心。中国的世界遗产遍布广袤国土,跨越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独特价值。从长城的蜿蜒壮阔到良渚的文明密码,从九寨沟的人间仙境到鼓浪屿的琴岛风情,世界遗产串联起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脉络,铺展开绵延传承的锦绣山河。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自然的馈赠,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载体。这一张张金名片,镌刻着中华文明基因,彰显着中国精神气质,每一张都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从1987年首批6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如今以61项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世界遗产涵盖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等多个类别,从多个维度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璀璨与辉煌。

《国家名片》以文化遗产为主,兼及全部类型,一书在手,即可来一场字里行间的世界遗产之旅。每一项世界遗产都值得认真探究,而这本书的每一篇文字,都值得细细品味。透过这本书,我不仅感受到了世界遗产的经典、厚重,还读出几个“新”来。

一是视角之新。书中对世界文化遗产作了创新性分类,没有采用传统的考古遗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观、历史城镇、遗产线路等分类,而是以“大写中国”“山水澄明”“天下一统”“梵音胜境”“人生百味”五大主题统领。“大写中国”一篇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殷墟等,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血脉基因;长城、大运河等大型线性遗产,是中国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地理标志;曲阜三孔、登封“天地之中”、北京中轴线等,折射出儒家思想和宇宙观的核心要素。“山水澄明”一篇中,庐山、黄山、武夷山等,表现了中国人对山水自然景观的独特理解;花山岩画、青城山—都江堰、杭州西湖、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体现了我国古人适应自然、创造审美奇观的杰出智慧。“天下一统”一篇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泰山、“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元上都遗址、土司遗址等,展现了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天坛、明清皇家陵寝,展现了皇家秩序的威严。“梵音胜境”一篇中,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梳理了佛教进入中土、石窟艺术不断本土化的历史脉络;五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布达拉宫,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孕育发展出的“圣地”。最有趣的莫过于“人生百味”这一篇:西递、宏村、福建土楼、哈尼梯田是农耕生活的代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泉州是商贸城镇的代表,澳门历史城区、鼓浪屿、开平碉楼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代表,共同描绘出天南地北中国人多彩的生活面貌。

细品这五大主题,会发现它们是在深挖遗产背后的文化特质,从物质世界走向精神世界,从五个维度深入观察这片土



苏堤春晓

嵩岳寺塔



《国家名片：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1月

地上最为深刻的文化肌理,展现出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定信念,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智慧,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宽广胸怀。这让我们能更为深刻地认知、理解这些遗产所蕴含的伟大创造、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真正读懂世界遗产。

二是文字表述之新。正是有了五大主题的引领,书中对每一个遗产地的描述都远远超出了“简介”的范畴。作者也摒弃了晦涩的学术表述,更多地将遗产地与思想、文化、制度、传统等结合起来,以鲜活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使这些遗产有血有肉有精神,读来韵味十足。

例如在“麦积山石窟”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石窟造像艺术与民间生活的融合:“唐宋之后,麦积山造像越来越贴近民间生活,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现实中的形象构建对佛的想象。到了明清时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出现了不少大红大绿、色彩非常艳丽饱满的雕塑……与北朝时期那些严正肃穆的形象相比,明清时期的麦积山犹如一个喧闹的民俗空间,和老百姓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了。”再如写到西递、宏村时,作者从古村落拓展到徽商文化:“这种‘贾而好儒’的特质,实则是徽商群体的集体写照。徽州崇文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宋代,徽州的教育水平已居全国前列,官学、书院、民办蒙学欣欣向荣。明清时期,在徽商资本的大力支持下,书院教育十分兴盛,宏村的南湖书院、西递的桃李园等,不仅规模宏大,更兼具讲学、藏书、游憩、居住等多种功能,是那个时代文风蔚然的重要见证。”随着文字徐徐展开,各个遗产地背后的文化密码一步步揭晓,我们也因此走得更近,看得更深。

三是图文融合之新。从宏观全景到细节特写,从人文场景到自然风貌,该书图画的选取相当到位。更重要的是,图画的编排设计与文字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可以说是笔下有图景,图中见学识,给人带来清朗愉悦的阅读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有特别的引申之笔,即观照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这为我们提供了具有世界视野的观察维度:既能深入体悟我国世界遗产的底蕴,也能在比较观照中进一步感知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独特地位与深远意义,从而再次强化其作为“国家名片”的价值。

这些“新”,让我们得以跟随文字游历各处世界遗产,旅途轻松惬意,于品读之间尽得文明滋养。五大主题让我们对遗产地有了新的认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帮我们揭开了遗产地的“神秘面纱”。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了这本书的帮助,我们就能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总之,《国家名片》是一部颇具新意的佳作,是一部系统解读中国世界遗产的宝典,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它让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读懂中国的“金名片”。

(作者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一本杂志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吗?对周忠和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20世纪70年代末,就读于江苏扬州江都中学的高中生周忠和,从班主任吴凤彩订阅的一本《化石》杂志中,窥见了史前生命的神奇世界。那本当时发行量达数十万册的科普杂志,为他打开了古生物学的启蒙之窗。多年以后,这个青涩少年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并出版了自己的首部科学传播文集《我的科普之道:科学精神与科学传播行思录》(以下简称《我的科普之道》)。

而那本改变周忠和人生的《化石》,正是他后来长期供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他从《化石》的读者变成作者,又从作者成为公众阅读视野中的科学家。

《我的科普之道》是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青鸟新知·智识”丛书的第一本。丛书取名“智识”,意在把科普从“传知识”升级到“养智识”。周忠和的这本书,为凤凰科技高端科普产品线树立起一块坚实的路标。

科学传播不是科研的附属活动,而是科学精神的自然延伸

1990年,25岁的周忠和在辽宁西部考察鱼类化石。两个月后,他独自返回那条山沟,意外发现两块保存完整的鸟类化石,距今约1.2亿年。这种早期鸟类后来被命名为“燕都华夏鸟”。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也让他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古鸟类研究。此后数十年,他和团队在热河生物群陆续发现多种长羽毛的恐龙和早期鸟类化石,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2025年,周忠和与徐星、季强共同荣获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科研之外,周忠和坚持科普写作30余年,累计100多篇。在《我的科普之道》的后记里,他自认“文字功底平平,写东西也算不上快”,并说这些文章“相较于本职工作而言,可以说是‘不务正业’”。这当然是他的谦辞。科学史家吴国盛在序中评价精准:“平实中见深刻,温和中藏锋芒。”周忠和则常说:“研究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启发未来。”这句话用在他的科普实践上,再贴切不过。他研究亿年前的化石,也用经年不辍的耐心,把科学精神一点一点讲给今天的人听。

该书分为四篇。第一篇“科学精神之魄”,从呵护好奇心、求真较真谈起,延伸到知识分子品格与科学探索动力;第二篇“科技体制之思”,直面科技评价改革、科研评审“打招呼”顽疾、基础研究定力与科研人员生活保障等现实难题;第三篇“科学传播之道”,阐述科学家做科普绝非“不务正业”,强调科普须以人为本,与人文精神、科学伦理融合;第四篇“科学常识之辨”,聚焦进化论百年误读,辨析“适者生存”的偏差,还原自然选择的本义。四篇由精神到制度、由传播到常识,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位古生物学家对科学精神的完整思考图谱。

这些文章多是应约稿“催出来”的,有随笔、演讲稿、序言,看似松散,却有一条暗线贯穿:科学传播不是科研的附属活动,而是科学精神的自然延伸。

在周忠和看来,科学家做科普是科研工作的自然延伸。2001年,他带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时,答辩现场带去了《科技日报》整版报道他们“辽西热河脊椎动物群”课题组的报纸——评委看到的不仅是一份申请书,更是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科研集体。项目最终成功获批。科普在这里不只是点缀,更是科研表达能力的训练场与跨学科交流的桥梁。

他总结的科学精神六字诀——“求真、探索、质疑”,不仅是科研的方法论,也是科普的底线。科学家写科普,不是“离开实验室去讲故事”,而是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里继续追问事实、逻辑与证据的意义。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多次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加强小学科学教育建言,把科普从个人志趣推向制度层面。书中,周忠和提出,稳定保障不仅是经费问题,更是让科学家不为五斗米折腰、心无旁骛做原创的前提。科学精神在周忠和笔下,从来不是悬浮的口号,而是落到评审、项目、薪酬、评价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实践。

呵护好奇心,就是给未来的科学家留一扇门

古生物学家看问题,时间尺度往往以百万年、亿年计。周忠和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尺度上看人生,荣辱挫折都显得渺小。这种超脱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教育关怀。他希望孩子们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而不是背诵标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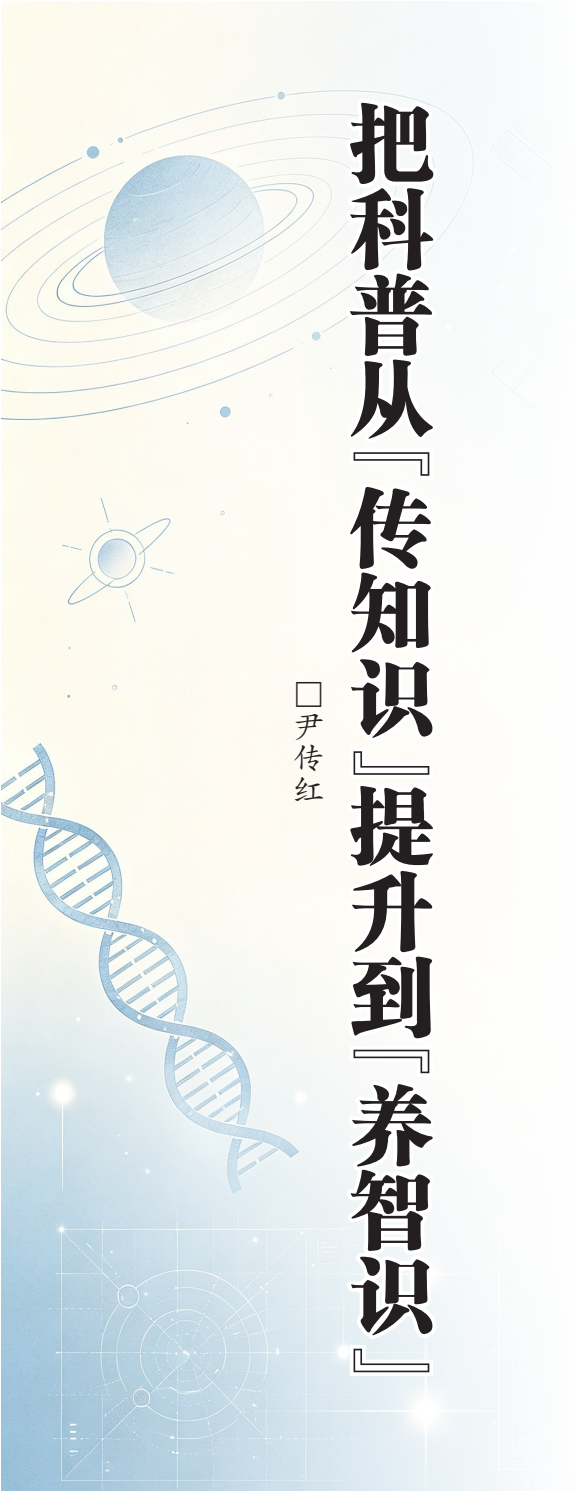
书中,周忠和反复提到两个关键词:教育重演论与博物学。教育重演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四阶段: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形式运算,大致对应着人类从直观感知自然到建立抽象逻辑思维漫长的历程。因此,小学科学教育应当从博物学起步:观察鸟、辨认植物、采集石头,让孩子先和自然打交道,再逐步引入系统性知识。

在周忠和眼里,博物学不是过时的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亲近自然的本能。但现实并不乐观。他调研发现,我国小学科学教师专职化比例仅为33.7%,县级以下仅为16.1%。科学教材版本多达8种,质量参差不齐,知识碎片化地堆砌,缺少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系统呈现。对此,周忠和的建议很具体:吸纳一线科技工作者参与教材编写,实施双师制,开设科普讲堂,推广科学阅读。这些并非空想,而是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中生长出来的。如果当年没有那本《化石》杂志,没有班主任看似偶然的举动,就不会有今天的周忠和。呵护好奇心,就是给未来的科学家留一扇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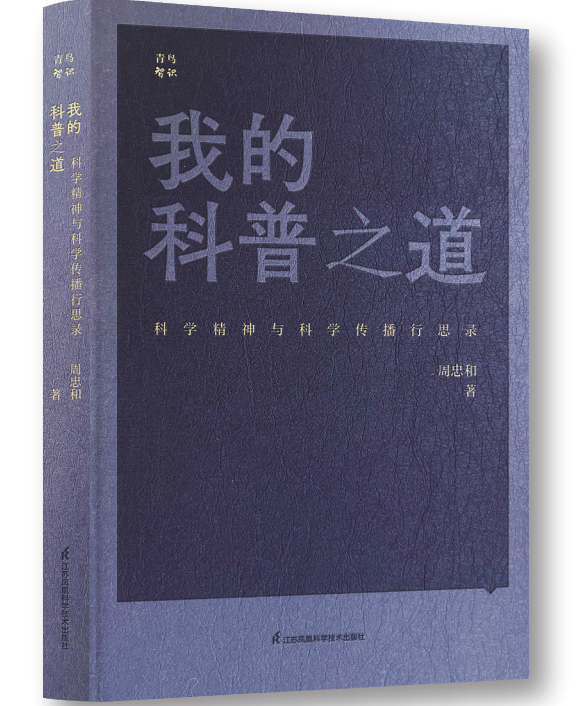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科学教育的终点不是把头脑填满知识,而是点燃思考的火种。周忠和的科普之道,说到底就是这件事:用亿年尺度上的生命故事,把那团火传给下一代。

常识之辨,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

书中最见功力也最见锋芒的部分,是周忠和对进化论常识的反复辨析。19世纪末,严复翻译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取名《天演论》,把这迢西方来的“西餐”做成了救亡图存的“中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8个字从此深入人心,却也埋下了百年误解的种子。周忠和提出:“‘适者生存’简直成了达尔文进



□尹传红



《我的科普之道:科学精神与科学传播行思录》,周忠和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9月

化论的代名词,事实上这是很不准确的。”自然选择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机制,作用于可遗传的变异,而非环境诱导的主动适应。法国文物学家拉马克认为,生物会主动适应环境,并由内在驱动力向高级发展;达尔文则揭示,变异并非源于环境诱导的主动适应,生物是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适应环境的。

周忠和写下这些辨析,实际上也是在践行自己的一句话:“宣扬科学精神比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当进化论被简化成“进步”“竞争”“优胜劣汰”的词语时,科学精神就死了。他反复提醒读者:进化没有预定方向,没有目的性,人类不是演化的终点。生物演化是对综合能力的长期考验,适应只是特定时空下的相对指标。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在今天显得尤其必要。常识之辨,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公共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本杂志的启蒙,到2025年一部文集的沉淀,周忠和走了近半个世纪。这条路上有化石的沉默,有文字的温热,有一个科学家对真理的坚守和对公众的赤诚。读《我的科普之道》,你读到的不仅是一本科普文集,更是一位学者长期以来在科研与科普之间往返思考的记录,而记录本身,就是路。

(作者系科普时报社长、中国科普作协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